

# 雪原火种生生不息

■ 剑 钧

## 影响我的书

去年夏天，我回到了家乡的老屋，从堆积如山的书房里，找到了那本珍藏近半个世纪的“老书”——《林海雪原》。书的封面翻卷了，书页也变黄了，旧日铅字排版的字体和当今激光照排的字体也有着明显的“代沟”。这部《林海雪原》是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也是恢复高考后，我上大学不久，在当地新华书店排着长队买到的。它还不算家中最老的版本。在我刚记事时，家里还有一部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出版的《林海雪原》。那个封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是白底儿，上方再配以不规则的白雪林海图，只可惜那个版本如今已无处寻觅了。

小时候我看不懂长篇小说，父亲就买来一套由《林海雪原》改编的“小人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包括《奇袭奶头山》《三路进兵》《深入虎穴》《智取威虎山》《将计就计》《大破四方台》6个分册。那时的我哪懂得分析人物啊，只知划分两种人，即“好人”与“坏人”。印象最深的好人是杨子荣、少剑波、白茹；印象最深的坏人是座山雕、小炉匠、蝴蝶迷。一群小伙伴都喜欢到我家看这套“小人书”，机关大院的李梦赢叔叔见到我也说：“把你的‘小人书’拿给我翻翻。”我听了心里特别得意。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东部小城，从地理划分上应属于我国东北区域。林海与雪原离我如此之近，故而每到冬天，孩子们都会拿着小木枪去打雪仗，有人扮演杨子荣，也有人扮演座山雕。我们会模仿“小人书”上的画面打打杀杀，会骑在那个倒霉的小“座山雕”身上，往他脖子那里塞雪团。

有一天，我看到一张父亲站在林海中，腰间别把手枪的军装照，就自然而然地与《林海雪原》联系到一起。我天真地问父亲：“爸爸，你认得少剑波吗？”父亲笑了，说：“那是小说。”随即他又补充道：“不过，少剑波还是有原型的。”至此，我方知道少剑波的原型就是小说的作者曲波，时为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军



杨子荣舌战小炉匠(插图)

孙滋溪作 外文出版社《林海雪原》

区2团副政委(小说中为团参谋长，代号203)。稍大后，我还知道了我军东北根据地是有“北满”和“南满”之分的。曲波所在的牡丹江军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隶属于北满根据地；父亲时为东北民主联军3纵8师24团的政治处主任，所在部队主要活跃在吉林和辽宁南部，隶属于南满根据地。

应当说，我最初的“英雄情结”就源于《林海雪原》。我七八岁的时候就看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林海雪原》。这部影片改编自曲波的同名长篇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分队智擒“一撮毛”，活捉“小炉匠”，以及杨子荣乔装为“胡彪”，单刀赴会“百鸡宴”等情节。

我曾入迷地守在家中那台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旁，收听电台播音的《林海雪

原》。人家讲得是绘声绘色，我听得是津津有味。英雄杨子荣成了我儿时的偶像。渐渐地，我也知道了，杨子荣确有其人，其原型为牡丹江军区2团3营7连侦察排长。他艺高人胆大，通晓“绿林规矩”和“土匪黑话”，心思缜密，是智取威虎山的功臣，获得过特级侦察英雄称号，只可惜在后来的剿匪战斗中牺牲了。

初读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时间记不大了，大概是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虽说有的字还不认识，杨子荣的故事早已烂熟于心，曲波笔下的奶头山、威虎山、夹皮沟，还有小分队英雄群像用青春和生命染红的雪，都像呼之欲出的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再后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搬上了舞台，我不止一次看过电影电视剧片，喜欢唱“穿

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经典唱段，对杨子荣的“打虎上山”和李勇奇的“苦大仇深”印象深刻。

上大学，我读的是中文系，老师讲授当代文学课，《林海雪原》是必读的经典小说。虽说我读过多遍原著了，但阅读的兴趣不减，小说的情节和语言就像磁石一般，牢牢吸引住了我的眼球。那时的我青春年少，看到书中少剑波和白茹的朦胧恋情，也难掩青春的悸动。像白茹偷看少剑波日记，写的那首情诗：“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体灵比鸟鸟亦笨，歌声赛琴琴声哑。双目神动似能语，垂髫散瀑瀑布发……”只是写到最后一句“我……”便戛然而止，害得白茹从心底疾呼：“这些该死的删节号！”那段情节的确写得挺有生活气息的。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一边是战火纷飞，一边是浪漫爱情，“小白鸽”的形象代表了战地女兵的美好与浪漫。

那时读《林海雪原》也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将来我也能写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该有多好，但旋即又自我否定了，以为那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不过，许多年后，《林海雪原》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乃至长篇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终于显现了。我以战争年代东北地区为叙事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古宅》，就写了一对青年军人在战火中相遇的生死恋情。

那年冬天，我和几位作家朋友去了长白山，再次领略到《林海雪原》描写的一方风光：“狂风卷着雪头，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而来。飞舞的雪粉，来往冲撞，不知何处是掬地而起，还是倾天而降，整个世界混沌沌沌沌沌茫茫，大地和天空被雪混成了一片。”这般场景，是我在儿时的故乡也能寻觅到的北国风光。我在登高处俯瞰林海雪原，那种震撼足以让我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也激发出我对先辈那段峥嵘岁月的崇敬之情。

一本书，犹如飞雪迎春；一段人生，宛若青春序曲。《林海雪原》影响了我的少年、青年，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塑造了我的价值观，也成为我心灵深处永不磨灭的时代印记。我与《林海雪原》之缘，就像绵延起伏的长白山和林海之间的故事。我在寻找逝去的青春，也在寻找梦想中的未来。

## 悦读分享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报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重要篇章。那时，中国社会风云激荡。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李大钊主持《晨钟报》，邵飘萍以“铁肩辣手”之笔鞭挞社会黑暗。他们通过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旧制度，唤醒广大民众，凝聚革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路英勇的纪实文学作品《急先锋》(作家出版社)，讲述了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展现了他们通过报刊力量实现思想启蒙与革命动员的艰辛历程，并串联起三人从思想者到革命者的精神蜕变。

谈起创作初衷，路英勇说，“他们办刊、办报实践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先进思想传播的‘立体矩阵’”“写作这本书，正是为了还原这一多元图景，让读者明白，思想的觉醒是无数先进人物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动的结果”。《急先锋》深刻揭示了“报刊实践”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

陈独秀开辟的是“破局之路”。他以《新青年》为旗帜，从“文学革命”入手，用极具战斗性的文风撕开封建思想的铁幕。他策划“双簧戏”，力推鲁迅的《狂人日记》、组织白话诗创作，展现出卓越的编辑能力。从《新青年》到《每周评论》，从关注“劳动者底觉悟”到“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陈独秀逐渐完成了从“思想启蒙”到“革命实践”的转变。

李大钊走的是“建构之路”。他注重理论的系统传播与青年的思想引导。他主编《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显示出专业性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受众的广泛性，将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可被读者接受的思想知识。李大钊不仅是理论的传播者，也是青年的引路人。他在《晨钟报》创刊词中，提出“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饱含理想主义精神。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在北京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10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也正好诠释了李大钊的办报生涯，是从“真理传播者”到“革命先驱者”的光辉历程与精神升华。

邵飘萍迈进的是“践行之路”。他从一线记者起步，最终创办《京报》，以

# 以笔为枪 以报为阵

——读纪实文学作品《急先锋》

■ 苏 虹

“铁肩辣手”为己任，坚守新闻工作者的良知与操守。在《急先锋》一书中，路英勇挖掘到这样一个历史细节。1917年8月的一个上午，邵飘萍偶尔“听到隔壁传来有人打电话的声音”，立即追踪到“参战还是中立”这一吵嚷不止的“府院之争”敏感话题。他机智地从美国使馆参赞口中探听到消息，并在段祺瑞处得到证实，然后用密码电报将消息发给《申报》，成为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大新闻。邵飘萍此举并非仅是单纯的专业主义精神，而是其正义感的充分体现。他在日本流亡期间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归国后将先进思想融入了新闻实践。

路英勇认为，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之所以能完成从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转变，是因为他们不是在书斋中空谈理论，而是直面社会现实并将革命理论付诸革命实践。他们将报刊变成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平台，并逐步从思想的先锋成长为革命的先锋。

# 《四世同堂》书写平民史诗

■ 胡 哲 蔡云瑞

## 经典重读



《四世同堂》是作家老舍反映抗日战争，弘扬中国人民伟大爱国精神的不朽之作，也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经典。重读这部作品，我们不仅能够触摸到北平小羊圈胡同里的烽火岁月，更能感受到普通百姓强烈真挚的家国情怀。

作家老舍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向上不屈的力量，进而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小说中出场的人物有40多个，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有祁家的祁瑞全与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诗人钱默吟。艰难时刻，他们坚守心中信念，在动荡年代闪耀出人性的光芒。

正如鲁迅祝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那样，祁瑞全正是这样的代表。他接受新思想，“爱书，爱家庭，爱学校，爱北平”，更爱自己的国家，“希望它会永远完整，光明，兴旺！”在民族危难之际，他意识到应该走出自己的一方书桌，走出赖以生存的北平，到广阔天地去参加抗日。在大哥祁瑞宣的帮助下，他毅然离开家来到陕北与当地群众共同抗战。在与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他看到了中国民众的优良品质与旺

盛的生命力，意识到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段经历让祁瑞全的爱国情怀有了具体的对象，有了对国土的眷恋感与保护意识，也让我们在血泪史中看到了光明。

残酷的战斗环境，磨砺了祁瑞全沉着冷静、机智勇敢的性格。当他得到命令需回到北平时工作，面对敌人盘问，他镇定自若，乔装成乡下掌柜迷惑敌人，成功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为了打击汉奸蓝东阳的嚣张气焰，祁瑞全借敌人之手捎给蓝东阳一个装了一颗子弹的信封，吓得蓝东阳从此一病不起。可以说，祁瑞全彻底实现了自身的蜕变，成长为一名兼具勇气、智慧和责任感的战士。

钱默吟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寄寓了作家的文化思想。老舍曾说：“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肯贫，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作为传统文人，钱默吟起初并不关心时事，除了必要的会客外，他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品酒、养花、作诗。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他无法再独善其身。北平城陷落后，他忧虑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半夜翻墙到隔壁的祁家向祁瑞全请教中日战事。他不能容忍日本人侵占北平，支持二儿子仲石的抗日行动。因汉奸晓荷向日本人告密，他被关进监狱身受酷刑也不改气节，坚决不向敌人投降。出狱后，钱默吟彻底觉醒，一改从前的文人习气，从一个只喜爱诗酒花草的隐士变成了不怕流血牺牲的战士。他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对北平市民进行启蒙和救亡宣传，鼓励年轻人去为国家作贡献。

更难能可贵的是，钱默吟有广博的胸怀，在抗争中始终保持善良美好的品性。面对告密者冠晓荷，他没有置人于死地，而是劝告冠晓荷要迷途知返。在

尤桐芳与冠高第陷入迷茫时，她给她们的生存意义，指明前行的方向。他在给自己的孙子起名时，将原本的“钱仇”换成“钱善”，希望后辈能够保持人的善心，建设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一切行为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也让钱默吟这一人物形象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除祁瑞全与钱默吟外，小说中还塑造了众多普通市民形象，有宽厚和气到觉醒反抗的祁老人，有热情善良、具有侠义精神的李四爷，有爱憎分明、敢于同敌人拼命的车夫小崔，还有韵梅、李四妈、高第等不甘受辱、坚决支持抗日的女性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优秀品格。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撑起了民族的脊梁。

老舍曾言：“我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战的武器。”可以说，《四世同堂》正是作者将个人艺术生命融入民族命运的自觉实践，也是对中华文明在危机中如何传承与重塑的深刻文学表达。



# 长征

第6646期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魏巍原著,王素改编)

沈尧伊作 北京画院藏



## 文与画

# 地球的红飘带

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铭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

——魏巍《地球的红飘带》(卷首语)

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出版社)，是画家沈尧伊根据魏巍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为蓝本，由王素改编后绘制的。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沈尧伊先后5次走上长征路写生，采风、访问长征亲历者，考察历史古迹。他说：“我的想法很单纯，沿着历史之路亲身走进，‘设身处地’才能引导观者‘身临其境’。”

在回忆徒步翻越大雪山——夹金山的情景时，沈尧伊说：“向导说我运气好，赶上好天气。4月份，转暖时节，又没到雨季，连咬人的旱蚂蚱也不多见。要是再早再晚都难以过山。尽管如此，此行之艰难对我来说是空前的。在缺氧的情况下登山，一步一停，休息次数越向上越频繁，登上顶峰用了整整8小时。我边走边想，当年有的红军战士还过了3次夹

金山，这真不敢想象，要是我非掉队不可，也许是因为他们年轻吧。不过，我马上想起了徐老(徐特立)，他长征时已57岁，整整大我10岁呢！”在创作上，每一幅画从构图图的完整性、刻画的深入度到形象的凝练性，沈尧伊都以创作独幅画的态度和标准来绘制。“经再三犹疑，我放弃了惯用的大块黑白对比，而采用近似琐碎的如实描述，我称之为‘没有技法的技术’。当我听到亲历长征的老革命说，‘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沈尧伊用6年时间创作完成了这926幅的连环画作品，艺术再现了红军长征历经困苦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这部作品先后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第四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一等奖等荣誉。(王梓源)